



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 关系探源

下卷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mintern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黄修荣 黄黎 著

海外借



人民出版社

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 关系探源

下卷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mintern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黄修荣 黄黎 著

统 筹:图典分社

策划编辑:侯 春

责任编辑:侯 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关系探源(全二卷)/黄修荣 黄黎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9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7-01-016427-4

I. ①共… II. ①黄…②黄… III. ①共产国际-关系-中国共产党-研究
IV. ①D16②D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55028 号

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关系探源

GONGCHANGUOJI YU ZHONGGUO GONGCHANDANG GUANXI TANYUAN

黄修荣 黄 黎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65.25

字数:1305 千字

ISBN 978-7-01-016427-4 定价:150.00 元(全二卷)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第六章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的中国共产党

第一节 国共合作破裂后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反抗

一、共产国际、联共(布)与南昌起义和八七会议

在革命遭受严重失败的极为严峻的形势下,要不要坚持革命?如何坚持革命?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两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为了挽救革命,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7月12日在汉口进行改组,成立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动行径,决定撤回参加武汉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随后,中共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从汉口转移到武昌,在初步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之后,“立刻决定民众武装暴动的新政策,规定湘鄂粤赣的四省秋收暴动的计划”^①,并派遣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人赴江西九江,准备“集合我们的武力,依张发奎回粤徐图发展”。^②

张发奎时任武汉国民政府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辖第四、第十一、第二十军),曾在北伐战争中立下过赫赫战功,与共产党人有过较为坦诚的合作。在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叛变革命后,张发奎对于继续以“东征”的旗号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争夺地盘并不积极,不仅仅是因为他和唐生智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也是出于本身利害考虑。当时的两湖地区已为唐生智所把持,江西是朱培德的天下,河南被冯玉祥占有,而张发奎却无任何地盘可言,因此,他打算“第一步按兵不动,第二步渐次往南昌移动回粤”。^③

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认为:“如果张发奎能够不拥护汪精卫,则我

① 《南昌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55页。

② 《南昌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79页。

③ 《南昌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50页。

们可以与他合作回粤,否则实行脱离关系”。^①同时决定,由叶挺任师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由叶挺独立团扩编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以及倾向革命的贺龙的第二十军,从武汉、鄂东一带向九江、南昌集中。

7月19日,李立三、邓中夏等人到达九江后,发现情况有变:“朱培德之三军移驻樟树,九军移驻临川。程潜之六军经江西之□□(原件字迹不清)萍乡分道向南昌集中,有包围我军之形势。在政治上武汉政府已完全反动,唐生智正在积极屠杀我党,压迫工农运动。”^②

而在唐生智、朱培德等部的强大军事压力之下,张发奎也开始明显右转,因为他面前只有两条路可供选择:要么“分共”,要么反汪。他最终选择了前者,并有“在第二方面军之高级军官中的共产党分子如叶挺等须退出军队或脱离共产党之表示”。^③

7月20日,鲍罗廷在听取聂荣臻等人关于策动工作的汇报后,召集第一次九江会议。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叶挺、聂荣臻等人参加了会议。会议根据张发奎与汪精卫勾结,并计划在第二方面军中开始“清党”等情况,议定放弃原定联张回粤的计划,在军事上赶紧集中于南昌,联合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在南昌暴动,解决国民革命军第三、第六、第九军在南昌的武装;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政府。随即由李立三等人将此意见征得在庐山的瞿秋白同意,并请瞿秋白转报中共临时中央决定。

在中共中央酝酿和决定发动南昌起义的同时,汪精卫、张发奎也感到叶挺、贺龙的部队不稳定。他们一方面下令调叶挺、贺龙部向德安一带集中;同时,令第二方面军其他部队从九江自北向南,第五方面军从南昌、樟树自南而北布防,形成对叶挺、贺龙部的夹击之势。另一方面又准备召集叶挺、贺龙赴庐山开会,企图施以拉拢或威逼,以便控制他们这两支部队。

鉴于贺龙对南昌起义的积极态度,7月24日,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李立三等人在九江举行第二次会议,进一步讨论南昌暴动事。军事方面,提出军队于7月28日以前集中到南昌,7月28日晚举行暴动,并急电中共临时中央征求意见。

为了进一步指导中国革命,共产国际派罗明纳兹来华接替罗易和鲍罗廷的工作。7月23日,罗明纳兹到达武汉。协助他工作的德共党员纽曼

① 《南昌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80页。

② 《李立三百年诞辰纪念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37页。

③ 《南昌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82页。

(也译作牛曼)也同时到达。

罗明纳兹,1898年出生于俄国高加索地区的格鲁吉亚,1917年3月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做青年团工作,后做党的工作。1922年11月5日至12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彼得格勒举行,罗明纳兹首次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代表团成员身份出席。在共产国际与联共(布)党内,罗明纳兹坚决拥护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的斗争,从而在青年共产国际和共产国际中开始担任比较重要的领导工作。1926年2月27日至3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的全体会议举行。罗明纳兹参加了会议,并以青年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发了言。同年4月,他作为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在共产国际主席团担任了领导工作。这以后,罗明纳兹还参加了1926年11月22日至12月16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的全体会议。

到达汉口后,罗明纳兹力主召开中共临时中央紧急会议,以便审查旧的政策,确立新的方针,清算陈独秀的右倾错误,选举新的中共中央领导成员。

7月2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就南昌起义问题作出专门决定,并将此决定以电报的方式直接发给罗明纳兹和加伦。电报说:“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否则,我们认为更合适的是让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来做政治工作。我们认为乌拉尔斯基和我们其他著名的合法军事工作人员参加是不能容许的。”^①

7月26日,在收到共产国际来电后,罗明纳兹召开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张国焘、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少共国际代表范克、顾问加伦等人参加了会议。罗明纳兹传达了共产国际、联共(布)的指示。加伦在会上表示,如果张发奎同意回师广东、不强迫共产党人退出其部队,则不必举行暴动。经过讨论,会议决定举行南昌起义。会议还决定派张国焘去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中共临时中央的决定,由瞿秋白、张太雷、李维汉同罗明纳兹一道筹备召开中共临时中央紧急会议。

7月27日,周恩来由九江到达南昌,即日组成中共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为委员。7月28日,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成立,贺龙为代总指挥,叶挺为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任参谋长。同时,在江西大旅社召开前委扩大会,决定7月30日晚举行起义。

^①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19号(特字第97号)记录》(1927年8月11日),黄修荣主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

7月29日,南昌的形势更加紧张。汪精卫、张发奎等人似乎对即将发生的起义有所察觉,在庐山又作出了妄图进一步镇压和消灭共产党的三条决定:第一,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部队撤回九江;第二,封闭国民党九江市党部、九江书店、九江《国民新闻报》,并逮捕其负责人;第三,在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

7月30日晨,张国焘从武汉赶到南昌,以起义没有成功把握和必须得到张发奎的同意为由阻挠起义,遭到前委成员的一致反对。但因张国焘系中共临时中央代表,不能以多数决定,争论至深夜未决,原定7月30日晚起义的计划被迫推迟。7月31日,南昌起义前委继续举行会议,决定8月1日晨4时开始起义。后因起义时间泄露,前委决定提前两小时行动。

8月1日,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的领导下,南昌起义爆发了。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全歼守军3000余人,占领了南昌城。聂荣臻在南昌附近的马回岭将第二十五师的大部分部队也拉出来参加起义,并于8月2日赶到南昌。对于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战斗,叶挺做了如下记述:“八月一日上午(凌晨)二时解除武汉军的武装,发生激烈的战斗(因贺龙所属一营长在事前泄露机密,敌人已有严密的警戒)。至天明即将南昌城肃清。贺龙所获枪支约二千支、子弹十余万发,我们所部获枪二千余支,共五千支,子弹七十万发,大炮数门。”^①

这次起义仍然使用国民党左派的旗帜,起义胜利后,成立的领导机构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宋庆龄、邓演达(此二人未到南昌)、贺龙、周恩来等25人为委员,以宋庆龄、邓演达等7人组成主席团。起义部队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下辖第九、第十一、第二十三个军。革命委员会任命贺龙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代总指挥、叶挺为代前敌总指挥。

8月3日,起义军按照中共临时中央在起义前的决定,开始撤离南昌,取道临川、宜黄、广昌,南下广东。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用血与火的语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继续坚持革命的坚强决心,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了一面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斗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为了切实贯彻1927年7月1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决定》,总结大革命的经验教训,纠正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确定

^① 叶挺:《南昌暴动至潮汕的失败》,《南昌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81页。

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在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罗明纳兹的督促和中国共产党内许多党员的强烈要求下,中共临时中央紧急会议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举行。出席会议的有部分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中央监察委员、青年团代表及两湖代表、中共中央军委代表共21人。罗明纳兹以及协助他工作的纽曼、洛蜀莫娃也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议程有4项:(1)听取罗明纳兹的报告;(2)讨论并通过罗明纳兹起草的紧急会议告全党同志书;(3)听取瞿秋白作关于党的新任务的报告;(4)选举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成员。

罗明纳兹首先在台上作报告。他在说明了召开紧急会议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之后,围绕他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草案的内容着重阐述了以下5个问题:

第一,严厉地批评了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的右倾错误。

罗明纳兹在报告中开门见山地指出,共产国际要中国共产党召开这次会议,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指导错得太远了。不召集此会来纠正,中国共产党将不成其为中国共产党了。他说:“过去的错误是在指导机关,(共产)国际对于群众方面的英勇的行为仍是非常满意的。”他认为,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的最大错误,就是“未将(共产)国际的指导达到群众中去”。^①他指责说: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主要决议案,尚未译出,许多中共中央委员都不知道。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决议,也还没有传达到群众中去讨论。中共中央委员即使知道了共产国际的决议,也不过只是口头上承认,甚至于根本不接受。

罗明纳兹认为,从1927年4月开始一直到7月底,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都是按照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来决定自己的策略。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的让步,甚至失掉了我们党自己的独立性”。党的领导机关对工农运动的政策,不仅是“可耻的”,而且是“改良的”“变节的”。他说,党压制了农民运动,“结果使农民运动遭了大的摧残,农民群众遭了大的屠杀”。党要工人让步,“结果使工人运动大大失败”。^②

罗明纳兹指出,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所犯的错误,并不是个别的、一般性的错误,而是执行了机会主义方针的严重错误。中国共产党如果不抛弃这一机会主义方针,纠正过去的错误,那就不能正确地制定出今后的革

① 《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报告》,《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9、54页。

② 《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报告》,《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51页。

命任务,也就不能领导新的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要纠正过去的错误方针,就必须指明它是怎样错的,使每个党员都接受过去的教训。

在为八七会议起草的《告全党党员书》中,罗明纳兹指出,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之所以执行机会主义政策,并陷入机会主义的泥坑如此之深,“其原因之一,便是党内情形不好”,即党内生活状况不正常,缺乏民主制度。这表现在:“党里面完全是宗法社会制度,一切问题只有党的上层领袖决定,而‘首领’的意见不但总应当认为是必须服从的,而且总以为无条件的每次都是对的”。他写道:由于“没有党内的生活,没有党内的舆论,没有对于指导者的监督,没有党员群众对于指导者的督促”,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得以放开手去实行自己的机会主义”,“中央的领袖独秀同志有许多问题虽经决议后,他仍要以个人的意思来改变此决议”。罗明纳兹指出:“以后我们党的指导要集体化,不要族长化。党的问题要使群众知道”。他警告说:“现在一定有人以为他自己是在党之上的,或者他要非难我们今天选出的临时政治局。我们对此应用党的纪律去与之实行坚决的斗争”。^①

罗明纳兹在会上尖锐地批评了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所犯的右倾错误,尤其是揭露了陈独秀在统一战线中对资产阶级无原则的退让和放弃革命领导权的种种表现,这无疑是正确的。他在报告中提出要加强党内民主生活和集体领导的建议,也是对的。但是,他批评陈独秀不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是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如前面所述,陈独秀之所以犯严重的右倾错误,除了主观因素外,同他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某些错误指示也是分不开的。

第二,分析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应采取的策略。

罗明纳兹在报告中正确地强调,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他指出,中国无产阶级虽然人数较少、经验不多,但其他任何阶级都不如它有力量。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非常薄弱,如果没有国际资本的帮助,它早就倒台了。中国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人数虽多,但事实已证明它们是不能领导革命的。

在分析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时,罗明纳兹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在过去的一定阶段中是革命的,但现在已经反动了。它害怕工人阶级比害怕帝国主义厉害得多,不惜与帝国主义妥协来压迫无产阶级。基于这种认识,罗明纳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35—55页。

兹认为,中国共产党不应该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帝国主义,而应该揭穿帝国主义的阴谋,以达到反对资产阶级的目的。他说:“我们不应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帝国主义”,而应该懂得“只有资产阶级打倒后帝国主义才能打倒”。他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错误地同反对资产阶级并列,认为中国共产党“应很坚决的不仅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余孽,并且还应坚决的反对资产阶级”。^①

罗明纳兹的这些意见,并不是他自己的独创,而是根据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当时的理论与政策提出来的。

1927年4月21日,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发表《中国革命问题》一文,认为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标志着民族资产阶级退出革命。同年5月24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上说:“当中国革命还是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的时候,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所坚持的不是支持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而是利用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后来,当中国革命已成为土地革命而民族资产阶级开始离开革命的时候,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就用和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武装斗争的政策代替了那一个政策。”^②7月底8月初,斯大林又接连发表文章和讲话,认为在广州时期,民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到了武汉时期,蒋介石和民族资产阶级都转到了反革命阵营;汪精卫叛变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脱离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只剩下了农民和城市贫民。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也认为自从蒋介石叛变后,民族资产阶级离开了民族革命战线,跑到了反革命阵营。

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把民族资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混同起来,把民族资产阶级和中间势力统统作为危险的敌人与打击对象,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以此作为分析中国的阶级关系和制定策略、方针的主要依据。这就从阶级关系上混淆了革命的阶段性,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情况,成了后来中国共产党屡犯“左”倾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提出了有关土地革命问题,把实行土地革命确定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基本方针。

罗明纳兹在会上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明确指出:“目前中国已进

① 《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报告》,《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52、53页。

② 《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的讲话》,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01页。

到土地革命时期,土地革命可以引中国革命到另一新的阶段”。他在报告中还指出:“中国农民仍不能有独立的阶级政策,他不跟无产阶级走即跟资产阶级走”,“只有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农民也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能求得自身之解放”。^① 他批评了陈独秀等人在农民土地问题上的错误,认为在大革命后期,如果能坚持党的独立性、正确领导农民运动的话,就不会遭受如此之大的失败。在罗明那兹的帮助下,这次会议经过讨论作出了《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规定要没收大地主及中地主的土地,没收一切所谓公产的祠族庙宇等土地,把这些土地分给“佃农及无地的农民”。这个议决案还规定,对于小田主则减租,租金率由农民协会规定之。^②

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是共产国际对当时中国革命提出的一项基本任务。八七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第一次把实行土地革命确定为党的总方针。与此同时,会议在罗明那兹的帮助下把土地革命同武装斗争直接联系起来,从而确定了党的武装暴动的总政策。共产国际的帮助,虽然对会议确定土地革命的总方针起了很大的作用,但罗明那兹在会上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精神,提出了中国的土地革命必须实行土地国有的主张,再次强调指出“土地的根本问题是土地国有”,而土地国有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的社会经济的内容”。^③ 很明显,这种土地国有的主张在当时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对土地革命造成了不良影响。

第四,在同国民党的关系上,提出了要开展“左派国民党”运动的主张。

罗明那兹在会上指出,无产阶级在联合战线中应该“有独立存在及坚决的批评的自由……列宁说:如果在联合战线中不能独立的存在,不能有批评的自由,则等于出卖阶级的利益”。^④ 他批评说,中共中央的主张恰与此相反,仅仅同国民党的几个上层领袖联合,将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政策及批评国民党的权利取消了,并放弃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甚至于工农运动也要让国民党来做”,“这是非常错误的”。^⑤

他在报告中重申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人在宣布退出武汉国民政

① 《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的报告》,《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50 页。

② 《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39 页。

③ 《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关于农民斗争决议案的发言》,《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74 页。

④ 《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关于农民斗争决议案的发言》,《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79 页。

⑤ 《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的报告》,《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53 页。

府的同时仍应留在国民党内的主张,认为“现在不应退出国民党,与国民党破裂时,要在国民革命成功社会革命时才能提出”。^①他说,为什么不退出国民党呢?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共产党人留在国民党内有三点作用:(1)可以坚决反对国民党右派、戴季陶主义及其“变国民党为资产阶级政党”的意图。(2)虽然国民党的上层叛变了,但可以在国民党的基层加紧做工作,组织左派队伍。(3)有利于批评和稳定中间派。根据罗明纳兹传达的共产国际这一指示精神,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这个议决案阐述了中国国民党应当组织工农暴动于革命的左派国民党旗帜下的理由:(1)中国国民党是各种革命阶级的政治联盟之特殊的形式;(2)中国国民党是一种民族解放运动之特别的旗帜;(3)便于吸引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分子。因此,这个表达了共产国际意见的决议强调:“中国共产党现在不应当让出(国民党)这个旗帜,使一般叛徒篡窃国民党的名号,而做军阀及反动资产阶级掌握里的玩物”,“凡是在革命的国民党旗帜之下举行暴动而胜利的地方,工农群众团体应当用团体加入的方法,加入这种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群众团体联合的党,使反动分子不能假借国民党党部名义,来实际上做阻滞革命的工作”。^②

罗明纳兹在为八七会议起草的《告全党党员书》中痛斥蒋介石、汪精卫等人出卖了革命的国民党之光荣的旗帜,但又提出,以后还是“要与国民党的左派联合,与他们的下层群众,与他们劳动群众的党员,与他们的下层的组织联合”。^③

在蒋介石、汪精卫等人接连叛变,革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共产国际还死抱着国民党的旗帜不肯放手,实在荒唐可笑。

第五,提出了关于中国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

罗明纳兹的报告和共产国际的许多文件一样,不顾历史事实,反复强调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路线和策略是始终正确的,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完全推给中共中央,根本否认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在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所犯的种种错误。

面对着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罗明纳兹也不得不轻描淡写地说上一句

① 《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报告》,《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54 页。

②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32、133 页。

③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8 页。

“(共产)国际有时自然也是有错误的”^①,但是,他接着连忙把话题一转:“(共产)国际有许多的经验,我们应当相信,接受他的指导,不然我们将会走到非共产主义的道路上去。”^②

对于罗明纳兹坚持为共产国际的错误开脱责任的做法,罗亦农、蔡和森等人十分不满。罗亦农在八七会议上当着罗明纳兹的面说:“大家都说(共产)国际是无错误的,我要公开的批评(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的政治指导不成问题,是对的,但在技术工作问题非常之坏。既认中国革命非常重要,但同时又派魏金斯基(维经斯基)、罗易来指导,他们都是无俄国革命经验的。魏金斯基在一九一七年以后才加入党,我们在上海要暴动时他要反对,并且不帮助。至于罗易,谁也知道是(共产)国际犯了左派理论幼稚病的人,这种人如何能指导中国的革命。(共产)国际的决议是好的,但派来的人不好,使人不满意。这是(共产)国际要负责的。”^③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认识水平,罗亦农虽然没有直接批评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方面所犯的路线和政策上的错误,但严肃地批评了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的错误,并追究了共产国际用人不当的错误。这种直爽的批评,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可是,罗明纳兹对于这些批评并没有正确对待,而是以种种借口搪塞过去。他一方面说:“谁也不敢担保没有错误,我也许将来有错误的”;另一方面又说:不管罗易、维经斯基等人的路线如何,“总比我们中央有错不改要好些。不管(共产)国际代表有无错误,主要的还是中共中央机关之健全。只要我们是革命的机关,纵使(共产)国际代表有错也是不十分严重的。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如何能实行(共产)国际的指导”。^④

在罗明纳兹作完报告之后,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作了关于党的新任务的报告。他在报告中着重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指出了中国共产党今后的策略方针。

这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等重要文件,坚决纠正了党在过去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号

① 《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报告》,《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54 页。

② 《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报告》,《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54 页。

③ 《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报告》,《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63、64 页。

④ 《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报告》,《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67 页。

召人民继续革命的战斗。八七会议确定的总方针,主要包括两个问题,即一个问题是实行土地革命,另一个问题是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

土地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虽然注意到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并在局部地区开展了减租斗争,但始终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要独立地领导革命斗争,就必须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支持和参加,才能使开展武装斗争和建立革命政权有广泛的、可靠的群众基础。因此,实行土地革命,既反映了中国革命的根本要求,又适应了现实斗争的需要。

实行土地革命,这是八七会议上确定的一个总方针。中共中央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作为新阶段的中心任务。虽然在大革命后期,共产国际就提出了土地革命的问题,但只是把它作为一般化的口号,并没有准备立即付诸实施;而这时所提出的要实行土地革命,与过去不同,它是作为党的总方针被确定下来的。八七会议按照中共中央7月20日通告中提出的“中国革命进到一个新阶段——土地革命阶段”的精神,进一步指出:“现时主要的是用‘平民式’的革命手段解决土地问题。”^①中国共产党的责任,就是要积聚各种革命力量,开展土地革命。八七会议规定,要“没收大地主及中地主的土地”,“没收一切所谓公产的祠堂庙宇等土地”,分给佃农和无地的农民,“对于小田主则减租”。八七会议强调:“农民运动的主要力量是贫农。”^②八七会议决定调派“最积极的、坚强的、革命性稳定的、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尽量分配到各主要的省份做农民暴动的组织者”,以建立革命武装和农民革命政权,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内容,亦是当时共产国际确认的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共产国际领导人明确指出“当前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土地革命”,强调“开展土地革命是一个中心问题、中心任务和中心口号”。^③显然,这种意见是正确的。八七会议根据当时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首次把实行土地革命确定为党的总路线的重要内容,是非常必要的、完全正确的。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66页。

② 《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97页。

③ 布哈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情况介绍》(1927年6月4日),孙武霞、许俊基等选编:《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25—1927)》,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68、470页。

关于武装起义,八七会议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现实的、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地、有计划地、尽可能地在广大区域内准备农民的总暴动。八七会议强调,工人运动和农民武装暴动必须互相结合,要注意武装工人及其暴动,巷战等军事训练,即刻准备能响应乡村农民的暴动,工人阶级应时刻准备能领导并参加武装暴动。八七会议作出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决定,是中国共产党在付出惨痛的牺牲之后得出的正确结论。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认识上的一个重大进步。

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

第一,会议研究了国内政治形势,揭露了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军阀的反动本质。会议指出:现在中国革命“正是很困难危险的时期——伟大的中国革命遇到了极艰巨的折磨”^①,蒋介石与汪精卫是一丘之貉,“在武汉领域之内如蒋介石之治下是一样的,他们所用的方法也是差不多的,农民协会被解散被禁止,几百几千的工农运动的指导同志被武汉政府的将领所残杀。农民运动所及的区域,无不受反革命的清乡所蹂躏。工人亦是到处受摧残,他们的武装被解除,他们的工会日益受着压迫或占领,他们的指导者亦被残杀,工会机关之中到处只见军阀豪绅指派来的走狗”。会议指出,国共合作破裂后,共产党的处境日益险恶,“一切反革命势力联合起来,反对共产党”,“现在他们不称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及蒋介石所领导的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为人民之公敌,却称共产党为人民之公敌”。“国民党中央驱逐军队中的共产党党员,我们的党不得不秘密起来,因为反革命派要想完全消灭我们,反革命暂时的得着了胜利,正拿着武装来对付劳动阶级。”^②

第二,会议总结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经验,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这些错误主要表现在:(1)党的主要领导人“不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不了解各阶级在每一革命阶段里的作用,以及共产党的作用”^③,放弃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采取了右倾错误路线。(2)“党的指导机关,一直没有注意中国革命运动中农民土地问题的意义”,“不能提出革命的行动政纲来解决土地问题”。当农民运动起来后,中国共产党没有能很好地进行领导和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49页。

②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49—250页。

③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55页。

予以支持,“实际上跟着国民党的的小资产阶级领袖,尽力在那里反对农民运动中的‘过火’”。^①这就使中国共产党失去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机会。(3)在国共合作中,“中国共产党应保持与发展自己党的组织,增加对于国民党工作的影响”,共产党却没有这样做,“而是国民党的上层分子完全在政治上俘虏了共产党的指导者”,“共产党的领袖简直没有想过政治上的独立,那么,对于国民党的动摇、不彻底的半途而废的骑墙政策,实际上当然不会有什么批评。”^②(4)在国共合作中,中国共产党“中央不但没有设法武装工人,它反而一遇见资产阶级方面的小不满意,立刻自动的解除武装”。^③

第三,会议确立了在国共关系破裂、中国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员的情况下,以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会议认为,面对中国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中国共产党也必须改变自己的策略,“只有广大的劳动群众积极起来反抗,实行革命的斗争,才能夺去篡窃国民党旗帜以实行白色恐怖的叛徒之武器,而扑灭反革命”。会议指出:“土地革命,其中包含没收土地及土地国有——这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的社会经济之内容。现时主要的是用‘平民式’的革命手段来解决土地问题,几千万农民自下而上的解决土地问题。”^④会议还强调:“共产党现时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尽可能的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利用今年秋收时期农村阶级斗争剧烈的关键。”会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应当在极短时期内调最积极的,坚强的,革命性稳定的,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尽量分配到各主要的省份作农民暴动的组织者”^⑤,而武装暴动的地点则集中在湘、鄂、赣、粤四省。

第四,会议确立了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在秘密状态下的组织问题和工作方法问题的各项原则。会议指出:“现时主要之组织问题上的任务,就是造成坚固的能奋斗的秘密机关,自上至下一切党部都应如此。”中共党员要严守纪律,“党部机关之一切决议及决定,调遣等,应当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66—267页。

②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73—275页。

③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64页。

④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51—266页。

⑤ 《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95页。

绝对的服从”。^①这一切都是适应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环境、改进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工作方法的必要措施。

八七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纠正并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八七会议决定在广大区域里发动和组织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从而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不仅决心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而且把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结合起来。这就给全党指出了正确的革命斗争方向。这次会议以坚定的革命方针、勇敢的战斗精神,重新组织了受到严重破坏的革命队伍,扭转了在党员和群众中弥漫的悲观主义精神,从而拯救了中国共产党、拯救了中国革命。八七会议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开始了历史性的转变:从参加武汉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转变到同它们公开决裂;从执行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转变到发动工农群众,确定武装起义的总方针,用暴动政策来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从忽视农民的土地问题,转变到把土地革命作为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中心问题。正如毛泽东所说:“八月七日,党中央委员会举行了非常会议……党采取了新的路线,同国民党合作的一切希望暂时是放弃了,因为国民党已经无可救药地成了帝国主义的工具,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了。长期的公开夺取政权的斗争现在开始了。”^②

八七会议,制定出继续进行革命斗争的正确方针,使中国共产党没有因极其严重的白色恐怖而惊慌失措,重新鼓起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勇气,从而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革命从此开始了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但是,八七会议也存在缺点和错误。这主要表现在由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罗明纳兹的“左”倾错误观点与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情绪相结合,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时没有注意防止和纠正“左”倾错误。对在革命处于低潮形势下党应当组织必要的退却缺乏认识,容许和助长了盲目发动工人罢工及组织城市暴动的倾向。会议不通知陈独秀到会,只是指责犯错误的领导人,没有着重从思想上、理论上对所犯错误的教训进行认真的总结。会议还不适当地强调党的领导机关和党员的单纯工人成分的意义。会议认为,反对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成(土地革命亦在其内),尤其是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完成,必须实现于反对已成为反革命的

^① 《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03页。

^② 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40页。